



有人说,这是2011年最震撼的画面……

有人感叹:两幕场景,凄凉又可悲。



“裸体讨薪”



“赤身求助”

在赤裸裸的生存现实面前,或许尊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。

发生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和深圳市的两幕场景凄凉又可悲:11月27日,一户农民工家庭因为拿不出治疗费,四口人裸体走上街头;不久,3个农民工在闹市上演了“裸体讨薪”。

有人说,这是2011年最震撼的画面,也有人直斥他们以裸体示人太“失节”。

但更多人说,“失节”的可能是他们,但蒙羞的是整个社会。”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## “赤身求助”

有着3个孩子的一对夫妻,想将生病的孩子接出医院,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的1500元治疗费。

### 除了裸体游街 别无选择

脱光衣服求助的农民工家庭来自河南舞阳,以捡废品为生。

丈夫今年50岁,妻子今年37岁。两人养育3个孩子。最小的那个刚刚出生两个月,还在当地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。

正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小生命,将整个家庭拖入绝境。11月27日,他们想将孩子接出医院,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的1500元治疗费。

对许多人来说,1500元只接近于一顿聚餐、一件大衣,或是一双球鞋。而对这对农民工夫妇来说,想获得1500元,除了裸体游街,他们再找不出别的选择了。

他们昂着头,紧紧攥住被晒得黝黑、只有半人高孩子的小手,穿过安静的居民区,又经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。

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。一位路过的摩的司机,不停地骂这对夫妻:“不应该带这么小的女儿,会影响小孩的。”

但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见也看不见,直至民警将他们接到车上。

当众脱下衣服时,已经没人能挽救他们的尊严了。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——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,当地妇幼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。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,接走了儿子。

## “裸体讨薪”

“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,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,过年没法回家。”

### “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”

“裸体讨薪”事件的主角,是54岁的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,他已经在深圳生活了21年。

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,他和13个同乡加入深圳一栋27层大厦的外墙翻新工程。他说,工程公司和工头拖欠他们共21万元,可工程公司却坚持说全部款项已经付清。

“我简直走投无路了。”老韩说。11月末的一天,他找了张旧纸板,请人用黑笔重重地写下:“要不到(工钱)是老板黑心?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?我们该怎么办?”

他举着牌子在马路边站着。一个梳辮子的男人指点他,“你这样没用,要找个人,把他衣服脱了,上街去。”

于是,从站在街边举着牌子等待打零工的农民工里,韩文德挑选了一个重庆男人,约好只要在街上站10分钟,就付给对方

150元。

接着,老韩要求重庆男人脱掉衣服。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:“那不行,你得再给我加50元。”

于是,在韩文德付出200元“买”来的时间里,重庆男人脚踩解放鞋,穿着一条贴身短裤,戴上一张写着“黑心老板”的纸壳面具。韩文德和另一个工友,分别站在两侧牵着他。

那一刻,自己的尊严已经不再重要了。韩文德只想着,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,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,过年没法回家。

有人问他,难道你不怕丢面子?他说:“丢了面子也不怕,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。”

走了几十米后,由于围观者太多,“裸体讨薪”的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。

# 农民工一脱再脱 羞辱了谁?

## 调查称: 农民的尊严感持续降低

农民工抛弃尊严寻求帮助,刺痛了整个社会的神经。而关于“尊严”的话题,已经进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者的视野。

今年11月28日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》,“农民眼中的尊严”正是其中一章。

这项调查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、270个村莊和4794户农户。调查表明,农民在就医、工作、购物、就餐、乘车、住旅馆、与政府官员交往、与有钱人交往时感觉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别为:4.7%、6.0%、10.9%、9.3%、7.2%、6.8%、3.7%、2.5%。与之相应,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:21.2%、19.4%、16.8%、15.9%、9.9%、7.9%、35.2%、34.5%。

因为有关知识、有信息,又比较敏感,会把自己和城里人作比较,调查结论表明,年轻人的尊严感明显低于年长者。

这项调查还写道,农民的尊严感有可能持续下降:“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,在贫富差距、城乡差距逐步拉大、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,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会出现下滑势头。”

## 专家说: 农民工尊严和欠薪相关

如何挽救农民和农民工的尊严?

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,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。在他看来,很多时候,农民工尊严都和欠薪相关。因此,要想提高农民工的尊严,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,并使他们的劳动环境得到改善。但更为重要的是,“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,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”。否则,“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,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,最终成为漂移到城市与乡村、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”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,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,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,“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,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”。

温铁军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“农村股份合作制”的乡村实验。按照“以土地为中心”的股份合作制,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,批租给乡镇,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,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。

在温铁军看来,“城市化过程中,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。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,个体表达高度分散。只有保护财产权益,才会有尊严。”温铁军说。